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 与社会效果

——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



马戎
主编

THE MECHANISM AND SOCIAL RESULTS OF INLAND
EDUCATION: THE STUDIES OF INLAND TIBETAN
AND XINJIANG SCHOOL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丛书主编 / 马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 与社会效果



——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

丛书主编 / 马戎

马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 / 马戎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0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667 - 2

I. ①内… II. ①马… III. ①少数民族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①G7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6615 号

·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

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

——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

主 编 / 马 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肖 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9.75 字 数：47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667 - 2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客座或兼职教授。1968~1973 年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1973~1976 年在内蒙古农牧学院农机系学习，1979~1982 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1984 年、1987 年先后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87 年到北京大学任教。1990~1991 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1997 年、2000 年和 2006 年先后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杜克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问题、教育问题、贫困问题、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等。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民族社会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等。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

马戎 著

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

马戎 著

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

马戎 著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的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管志翔、马戎 主编

“肯定性行动”

——美国族群政策的沿革与社会影响

王凡妹 著

化边之困

——20 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的政治、社会与族群

王娟 著

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

祖力亚提·司马义 著

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

马戎 著

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篇）

马戎 著

中国新疆的族群分层：结构与机制

马忠才 著

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

李健 著

从桂省到壮乡

——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研究

卢露 著

从大清到民国

——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熊芳亮 著

族体、语言与政策

——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

何俊芳 著

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

——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

管志翔 著

“中华民族是一个”

——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马戎 主编

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

——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

马戎 主编



宝源元

010-84498866

bly6688@vip.sina.com

THE MECHANISM AND SOCIAL RESULTS OF
INLAND EDUCATION:THE STUDIES OF INLAND
TIBETAN AND XINJIANG SCHOOLS

目 录

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导言）	马 戎 / 1
“内地新疆高中班”民族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	欧登草娃 / 37
新疆班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北京潞河中学新疆班调查	古丽孜依帕·依力拉斯 / 58
他们如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	欧登草娃 / 149
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流失现象研究	欧登草娃 / 167
内地新疆高中班高考制度研究	欧登草娃 / 181
上海内地新疆高中班德育教育成效调查研究	周巧云 / 201
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在校大学生访谈调查	唐元超 / 213
以发展的视角解读内地西藏班	严 庆 / 231
多元文化教育视角下的内地西藏班	尼玛顿珠 / 290
内地西藏班（校）学生语言学习使用和社会交往初探	孙 昉 / 345
内地西藏班（校）藏语文教育与语言交往：政策与实践	孙 昉 / 363
区隔与整合：内地西藏班的教育政策及其实践 ...	阳妙艳 尼玛顿珠 / 375
从“内地求学”到“返藏工作”	
——对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学校教育及族群认同的	
研究	阳妙艳 尼玛顿珠 / 395
北京西藏中学调查报告	孙 昉 / 418

附 录：

关于北京大学增加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建议	马 戎 / 454
关于我国各综合大学对“民考民”语言背景的研究生考生 实行破格录取的建议	马 戎 / 459
关于改善内地“西藏班”管理体制与培养工作的建议	马 戎 / 463

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

(导言)

马 戎

1984 年国家创办了“内地西藏班”，此后每年通过这一项目招收西藏自治区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城市完成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学业，利用内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条件，使他们在新的学习环境中被培养成建设新西藏的人才骨干。2000 年，国家开始为新疆学生创办“内地高中班”，毕业后升入内地大学。这些教育机制在办学模式中可归类于“异地办学”。“内地班”教育项目是中央政府为西部地区培养社会发展建设人才的国家级人才工程和战略性举措，各级政府为这些教育项目进行了巨大财政投入。到 2015 年，内地西藏班累计毕业 3 万余人^①，内地新疆高中班累计招生 8 万多人，这些学生毕业后返回西藏和新疆，为当地各项事业的加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陆续发表有关中国内地“西藏班”、“新疆班”的研究成果（严庆，2006；严庆、宋遂周，2006；Zhu，2007；Chen，2008；

① 内地西藏班举办 30 年来，至 2015 年累计为西藏培养经济社会建设人才 32116 人，其中培养大学毕业生 15159 人，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 4840 人，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 6870 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5247 人（http://www.gov.cn/xinwen/2015-05/30/content_2870828.htm）。

祖力亚提, 2009), 在不同层次和各个方面对“内地办学”的相关政策、运行机制和社会效果进行讨论, 引发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Postiglione, 2007)。今天, 我们应当如何对“内地班”多年办学的实践经验和客观效果进行总结? 中央政府为“内地办学”所设定的政策目标 (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就业技能、成为族群交流合作桥梁等) 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现实? “内地班”在招生、教学组织、课程内容、校园管理、参加高考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和改进? “内地班”在校生的实际思想状况如何? 在内地的文化和文化环境中, 他们是否仍然能够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 他们在内地学校的实际学习效果如何? 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和发展情况究竟如何? 这些少数民族毕业生是否能够融入中华民族的精英队伍? “内地办学”和西部地区当地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回答, 同时也都是关心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前景、关心我国少数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学者们始终关注的研究课题。

“内地办学”项目已先后进行了 30 多年, 也到了应该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候。我们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同时, 也非常需要对多年的内地办学经验进行深入的分析, 特别需要站在东西部平衡协调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看待西部地区教育体系中现存问题和“内地办学”模式所取得的综合性社会效果, 在社会实践中思考中华民族语言使用格局的未来演变趋势, 并在这些宏观发展的大格局中对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的社会现象和发展态势进行解析和讨论。

一 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 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

1. 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水准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 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因素固然十分重要, 但是人口素质即人才队伍状况已成为另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今天的国际竞争, 实际上拼的是人才。中国努力在 21 世纪推动全国的现代化进程, 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国际经济运行的全球化

潮流，今天我们对人才队伍进行评价时，既要考虑政治精英的施政能力和治理经验，也要以现代化、国际化为标准评价各个领域人才队伍和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与应用技能。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既需要有一大批战略眼光的高端管理人才和引领创新的科技人才，也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技工和设备操作人员。只要一个国家拥有或努力培养出一个整体素质较高、在各领域表现优秀的人才队伍，就一定能够克服自然资源匮乏、地理条件不利、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找到适合本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于一个地区也是如此。

2. 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差距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现存的发展差距有其历史原因，西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语言文化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给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难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与这些差异相关联的西部本地企业的创新经营能力、当地少数民族人才和劳动力素质与开放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近30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①。进入21世纪后，由于市场机制带来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这些差距更加凸显。

从长远看，要想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最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不断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包括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建设，使之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人才队伍的差距，这应当成为一项着眼于西部地区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学校教育体系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渠道，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严峻形势，就是西部地区学校（包括大学）与东部沿海地区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而制定的“211”、“985”计划在国家级重点大学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是也在客观上造成

^① 2015年江苏、浙江人均GDP达到约8万元，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仍为3万~4万元，贵州不到2万元。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8af78f0102wiva.html。鸦片战争后，自中国沿海被迫吸收西方工业文明之日起，交通相对闭塞、城镇化不发达的边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距离就在持续拉大。1949年后在全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差距一度有所缩小，但在推行体制改革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沿海与西部省区的发展差距又开始急剧拉大。

西部大学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加速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的重点大学，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大学之间在师资队伍和学生质量上的差距。大学和师范院校是中小学教师的主要来源，西部地区大学和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滑坡^①，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高端人才队伍之间的差距。如果中国希望在 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唯有加大力度缩小东西部人才队伍的差距，使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事业能够全面均衡地发展，这个中国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3. 评价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主要指标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宏观水平，在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中通常采用几个最基础的衡量指标，其中一个的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结构，另外两个是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还有一些更细致具体的统计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基本情况，如：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和毕业率、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每万人拥有的学校教师数量、每万人拥有的年教育经费（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学前和成人教育等）、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册数、每万人年均图书出版数、每万人拥有的文化事业（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剧院、体育场等）年均经费数额、人年均阅读图书册数等；对于专业科研人员队伍也有一些评价指标，如教师和专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每万人年均发表论文数和获得专利数等。有些指标的区域性统计数据出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中，但是还有一些数据很难找到，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同时政府也应鼓励民间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的调查和数据发布工作。

人口受教育水平结构反映的是人们接受各级正规学校教育的情况。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在 6 岁以上人口中，藏族“从未上过学”的所占比例为 30.56%，相比之下朝鲜族的比例为 1.29%，汉族为 4.71%，族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马戎，2013：663）。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必然受到影响，也缺乏在现代产业（包括现代化

①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滑坡，还有一个人们很少提及的因素，就是大批在 50 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下放”到西部中小学任教的城市知识分子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返回内地。

农牧业企业）工作的知识、技能和劳动习惯。人们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水平层级越高，对现代知识体系和工作技能的了解就越多，适应高科技产业工作的能力就越强。

就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反映了劳动力在农牧业、制造建筑业、服务商贸等各级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从侧面反映出人口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历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都提供了各族人口的全国性相关数据，可供研究者分析。我们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看到，近年来西部地区的本地少数民族人才和劳动力在人力资源市场调节机制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趋势。例如对比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这一趋势在维吾尔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维吾尔族农业劳动力在 16 岁以上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80.35% 增长到 2010 年的 82.74%，同时生产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的比例均显著下降。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从 2000 年的 64.46% 下降到 2010 年的 48.33%，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与全国整体变化方向是相反的（马戎，2014：104~105）。西部地区人才和劳动力队伍结构中出现的这一负向变化趋势，毫无疑问是近年来一些西部地区社会矛盾、族群关系不断出现预警信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社会生活和教育机制中的语言工具和知识体系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工具。我国有 56 个民族，使用的语言有 80 多种，21 个民族使用 24 种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86：554），其中许多群体有语言无文字，有些文字的使用群体人口规模很小。国家民委下属的民族出版社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和出版机构，主要编辑出版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 5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物，广西和四川分别编辑出版壮文、彝文出版物，这是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的基本状况。在这样一个语言文字实际使用情况的宏观框架下，我们在分析各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时，各族学生在学校使用哪种语言学习各门课程以及他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如何，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 语言的二重性

人类社会存在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创建该种语言文字的群体的文化积累与象征，是该群体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这一群体的历史，也凝聚着群体成员的情感。与此同时，语言文字可以被视作一种纯粹的交流和传播工具，不仅是群体成员学习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工具，也是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彼此学习对方知识的工具。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学习和交流的工具，这就是语言文字在功能方面具有的二重性。

各地人类群体在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是不平衡、不同步的，有的群体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有的群体发展相对停滞。因此，在群体间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每个群体都需要向在某些方面掌握了先进知识体系的其他群体学习，以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提高竞争力。在 20 世纪，现代国际社会已经普遍形成地理边界清晰，拥有独立主权、宪法、法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发行货币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共同体单元——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公认每个人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某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感到需要掌握自身所在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内通用的语言文字。由于各国创建历史和人口构成的特点，有些国家内部的正式通用语言可以有几种（如瑞士），有些国家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在推行国家通用语的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保护。无论属于哪种语言应用和学习模式，在今天，掌握本国的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该国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实现就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汉语普通话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人口超过 12 亿人。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仍是当地民众的母语和家庭社区生活中的主要交流工具，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语言使用格局。各族民众在本族聚居区使用和学习本族语言，参与族际交流时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宋才发，2003：363）。

1949 年后，政府在几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疆、藏区、内蒙古、

延边等)为当地少数民族学生开设了与普通学校平行的“民族学校”系统,各门课程的教学语言和教材采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时开设国家通用语即汉语文课。这样的教学语言与课程设置可以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母语文,掌握继承本群体传统文化的语言工具。但是,由于一些任课教师的汉语水平不高,学习课时有限,而且当地社区缺乏使用汉语的语言环境,在“民族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通常被称为“民考民”学生)掌握使用汉语文的能力普遍不高^①,有的甚至达不到口头简单交流的水平,这无疑对他们通过汉文书籍掌握更加全面和前沿的现代知识体系、拓展眼界和提升技能造成障碍,同时,也为他们在普遍使用汉语文作为交流工具的城市和东部、中部地区实现就业带来许多现实的困难。

2. 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和彼此相遇后的竞争态势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知识与技能,这些知识体系是以各群体的语言文字记载并流传下来的。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发展条件与演进轨迹不同,其各自创造的语言文字系统(文字类型、语法规则等)^②、形成的文明类型、积累的知识体系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汤恩比把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三十四个“文明”,斯本格勒将世界划分为七大文化形态(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鲁凡之,1988:26),亨廷顿则从国际政治角度仅仅强调了七八个“主要文明”(亨廷顿,1998:6)。有些文明划分框架无疑把许多地区(如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大洋洲)的土著人文明都忽略不计。

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在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不能说欧洲基督教文明比没有文字的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更优秀,因为各自都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都是人类社会文化基因的宝贵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各文明之间彼此接触和相互竞争时,确实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别,而且这一差别可以造成严重的社

① 在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学校”学习、高考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试卷的少数民族学生被称为“民考民”,那些在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普通学校学习、高考时使用汉文试卷的少数民族学生被称为“民考汉”。

② 如世界上的文字类型可大致区分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 <http://wenda.so.com/q/1369390016065269>,使用的语言有数千种,参见“世界上有多少种文字?”, <http://wenda.so.com/q/1362573557062323>。

会后果。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800名西班牙远征军征服了有2000万人口的墨西哥阿兹蒂克王国,1532年,皮萨罗率领不足200人的西班牙远征军征服了军队超过10万人的秘鲁印加帝国,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遭到灭绝性破坏。对于竞争中的弱者而言,学者们推崇的“文化相对论”毫无意义。

在鸦片战争中,船坚炮利的英国远征军打败了人数众多但武器落后、纪律松散的清朝士兵。在与西方侵略者作战中不断败绩、割地赔款的中国人,只能被迫向强势文化学习。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面翻译和学习欧美文明和知识体系,迅速崛起并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开始步日本的后尘,“废科举、兴新学”,把西方一整套知识体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历史、文学、建筑、冶金、造船等)和相应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教育)全盘吸收过来。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在许多方面向欧美各国学习现代化知识体系,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继承和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必须从其他国家学习一切能够提高我国竞争力的知识体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交往中真正做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基础上努力赶超西方科技先进国家。

3. 知识体系与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

从今天世界上的文化知识体系和语言使用格局来看,许多语言体系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对应的。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土地上,既存在承载中原地区几千年传统文明的汉语文体系,也存在承载藏传佛教和青藏高原文明的藏语文体系,承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蒙古语文体系,承载伊斯兰教传统和绿洲文明的维吾尔语文体系,还有承载其他区域性文明的许多族群语言体系和支脉。

在人类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这些语言与其承载的文明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对应关系,在语言体系的多样性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例如中国北方的蒙古语就与草原游牧文化密切相关,在描述牲畜、草场、牧业活动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词汇,但是缺乏与工业产品、城镇生活相关的词汇。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华夏文明是以汉字为工具发展起来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著名文献典籍都以汉字为载体。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主要以

阿拉伯文为载体。而欧洲基督教和工业文明都以拉丁文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为载体。

正因为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不同知识体系，与创建和发展这一知识体系的群体的语言文字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想要真正了解某一种文明，学习与之相对应的语言文字是必要的认识工具。而这种语言学习对学习者本身有时也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例如清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和儒学经典，要想真正学懂和理解其内容，必须熟练掌握汉语文，加之满人分散生活在广大汉族人口之中，到了清朝末年，满人的汉语水平几乎与汉人无异，同时满语逐渐淡出了使用的空间。而自清朝后期以来，我国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与农耕族群和现代工业产品的接触不断增加，为了进行交流和吸收新信息，蒙古语需要创造出与新生事物相关的新词汇，我们在交往中注意到，在蒙古族牧民实际生活用语中出现了许多简单借用交流对方词汇发音的“外来词”。

4. 一个知识体系经过系统翻译出版可以有新的语言载体

每个知识体系都以创造和发展这一体系的群体的语言文字为载体，所以一个群体如果要学习其他族群的知识体系，就必须学习作为其载体的相关语言。在这一点上，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显而易见。例如在唐朝时期，访问中原的日本“遣唐使”为了学习唐朝文化，首先学习中国汉字，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和发展出日文体系。通过玄奘等人译经的努力，汉文佛经也已自成体系。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感到需要“脱亚入欧”，便把各领域的欧美经典文献系统地翻译成日文，全面吸收欧洲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建立欧式学校和陆海军。甲午战争后，由于文字翻译上的便利，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知识体系时，又广泛地借鉴了这一知识体系的新载体即日文文献。例如1905年清朝创办西式小学时，使用的就是从日文教材翻译成汉文的课本（顾颉刚，1939）。中国人读到的第一本汉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①。因此，在现代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翻译出版事业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今天，国外的知识体系完全有可能

^① 1919年年底，陈望道把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成汉文，后经陈独秀、李大钊校对，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